

曾华国 / 著

“基金黑幕”使股市走向“熊市”

反思非典 (SARS) 报道

“金元宝”叩问记者良知

主编的视界决定了媒体的边界

更大的危机在于信息封锁

一支笔搅动一百万个舌头

《焦点访谈》与政府透明度

Chinese Muckrakers

中国式调查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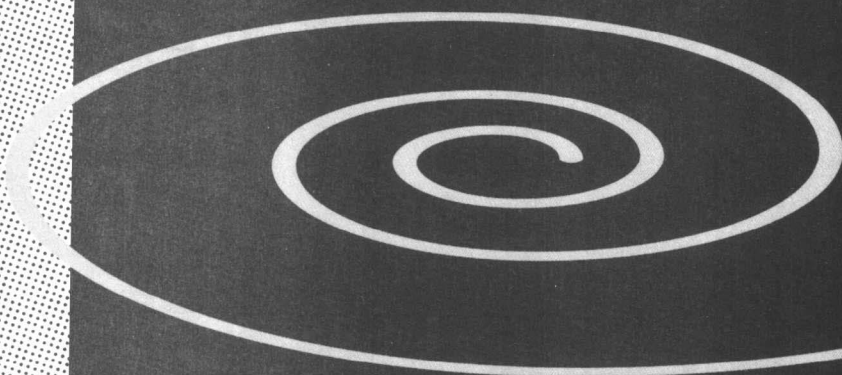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式 调查报告

**Chinese
Muckrakers**

曾华国 /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式调查报道 / 曾华国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

ISBN 7-80652-508-4

I. 中... II. 曾... III. 新闻报道—研究—中国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766 号

中国式调查报道

著 者: 曾华国

责任编辑: 赵 泓 阮清钰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为了沉默的真相

那些惊世骇俗的悲剧本身并不会说话。它们需要勇敢者代言。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那些有良知的“扒粪者”更需要特殊的素养：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也要有活动家的周旋；既要有士大夫的礼数，又得有梁山英雄的豪气；既要有文人的悲天悯人，又得有法官的冷静理性……

——题记

这不是一本纯粹的研究调查性报道的学术著作，而是掺杂着“扒粪者”（调查记者）职业体验和传媒研究者双重身份感悟的拙作。笔者从新华社内参到《新华视点》，从《瞭望东方周刊》到《董事会》杂志，从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到一名传媒研究者，多重角色体验使我有机会对调查性报道进行思考与反思。历任记者、编辑、总编辑助理、总编辑、制片人以及总裁等数个角色，笔者觉得最多职业快感的还是“调查记者”。从某个角度，我希望这些结合了政治学的经验与教训能给那些致力于新闻工作，特别是有志致力于调查性报道采编与研究者有所帮助。本书主要针对新华社内部报道、《财经》杂志、新华社《新华视点》、《瞭望东方周刊》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调查性报道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了解“扒粪者”的中国特色：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又要有活动家的周旋；既要有士大夫的礼数，又得有梁山英雄的豪气；既要有文人的悲天悯人，又得有法官的冷静理性……

本书要阐述的中国式“扒粪”打击的目标是现存的体制性缺陷。保守主义先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无赖假定”：所有的政治家都有可能成为无赖。为了防止政治家成为无赖，必须设立一道预防机制，并以制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即使政治家想做无赖，也没有机会做。把他做无赖的路径封死，哪怕让他做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也不让他做一个无赖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过：“好的制度坏人可以变好，坏的制度好人可以变坏。”好的制度就是按照“无赖假定”建立起来的制度，从而使坏人没法干坏事，好人受到保护。相反，如果在一个基于“圣徒假定”的制度下，假



定政坛的人物都是圣徒，大家把所有权力授予他们，可是一些人根本不是圣徒，而是无赖，或者一般人。他们不能达到公众的期望，如果没有制约他们的手段，没有针对无赖政治家的安检措施，我们对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中国较少人认识到这点，因而，制度性缺陷使许多无赖混进政治舞台，祸害人民；而好人在里面也慢慢地变坏。中国式“扒粪”的案例，不仅仅在于揭露某个事件的真相，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更在于唤醒人们对“无赖假定”的认识，从而设立防止无赖作恶的制度。

本书还主张要建立起中国“扒粪”新闻的评价体系，给予那些勇敢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扒粪者”更高的荣誉感与社会地位。目前中国新闻的评奖体系基本上以官方的评价标准为主流评价标准。这种按片面价值理念建构起来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无法适应当今中国新闻发展的需要，也无法突出中国新闻界需要倡导的方向，亟待补充与完善。例如，2000年中国新闻奖评选里没有《财经》杂志的“基金黑幕”或者《新华视点》的“事故揭黑系列”，2003年没有《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揭露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没有《瞭望东方周刊》的“经济学家为谁代言”，2005年没有“新兴医院调查”……在历年来的中国新闻界最优秀记者、编辑奖里的“范长江奖”和“邹韬奋奖”评选结果中，居然没有中国当代新闻界难得在国际上赢得声誉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及《南方周末》的前主编江艺平。这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

可敬的调查记者

在西方人心目中，调查性报道的地位是其他报道所不能取代的，许多优秀记者都把写调查性报道看作是自己的天职。正如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所说：“只有最高尚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情，最正确的丰富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附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上拯救出来。”^①作为美国“扒粪运动”的精神领袖，普利策对记者提出的要求激励着一批批有志之士追求社会的公平、平等和民主自由。

最为中国新闻界熟知的“扒粪事件”可能是美国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继《纽约时报》诉苏利文一案后，美国媒体“扒粪运动”的另一次高潮。1972年6月17日凌晨，刚刚进入《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年轻记者伍德沃德在采访晚间

^① 新浪网编：总编理念和传媒精神。北京：线装书局，2003.253

警察线时，碰巧报道了5个人闯入位于“水门”大楼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警察抓获的事件。当时这5人穿着工作服，口袋里装着百元美钞和精密的电子摄像设备。其他媒体对此不屑一顾，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事伯恩斯坦却敏锐地将此事和尼克松的连任竞选委员会联系起来。此后经过追踪报道，两名记者发现尼克松动用了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政府机构进行窃听等活动，以此达到连任的目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水门事件”。^①

“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是典型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也通称为“深度报道”。《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事实上，调查性报道并不等于深度报道，前者的范畴小于后者，简单地说，调查性报道就是深入揭示事物本质、把问题说透彻的报道。

大多数调查性报道重在揭露政府及公共机构内、社会团体中某些成员的不法行为，暴露社会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卫公众的利益，它们往往涉及社会生活中不为人知却有巨大影响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实现报纸职能和公众权利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调查性报道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② 调查性报道往往由具有敏锐嗅觉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数十倍的努力，把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的真相，揭示给受众。由于报道的独家性、轰动性以及故事性，调查性报道往往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传播力，从而达到影响社会、舆论监督、促进进步的作用，为传媒赢得较好的公信力。

在中国新闻的“扒粪”圈里，通常分为两种媒体，一种是“体制内”，一种是“体制外”。“体制外”，相对于传统的媒体体制，可以说成商业化、市场化媒体。前者属于政府系统编制，享受公务员的待遇，后者是各新闻单位在商业化运作后通过社会渠道招聘的人员。体制内的记者们，秉承的是舆论导向、政治仕途的价值观。即使同样是写揭露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事件，前者以写内参为荣耀，后者则是在与不正之风、不平等之事、不民主之人公开“叫板”。有时候，这双方相互鄙夷，谁也看不起谁。本书探讨的对象包括以上两种“扒粪”新闻及记者。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体制内的内部报道，如新华社内参，由于能够直接送达到某个层面的领导层，往往比公开报道更能够推动事情的解决。如“孙志刚事件”并不仅仅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也由于新华社内参把社会民情上报，

① 张巨岩. 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 北京：三联书店，2004. 220

② 杜骏飞. 深度报道写作. 第1版.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78



从而形成合力，最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笔者数年来游历于体制内外，因而试图在本书里对两种“扒粪”体制进行一些比较。无论在哪一种体制下，调查记者的体验总是令人情绪高涨。记得2000年第一个记者节，新华网开设了一个记者节专栏，邀请新闻界人士撰写有关文章。笔者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写了一篇题为《记者是一种理想》的短文。两天后，《扬子晚报》副刊作了转载，节选如下：

记者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理想——为了信念可以置生死存亡于不顾，为了梦想可以痴迷不悟终生不渝，为了抢夺时间心态只能永葆年轻。

短短几年来的记者生活，酸酸甜甜，感受颇多：危险的刺激，死亡的精彩，除邪的快乐……两年前，我曾沿着南中国海的海岸线，进行了一次别出心裁的走私与反走私采访。那时候，不止一次听到“我有钱，我怕谁?!”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语言，接触形形色色的涉嫌走私人：黑社会的头目爪牙，歪门邪道的走私分子，甚至部分海关、公安等执法人员。对于后者，我心里着实惊讶，转而震惊，继而愤怒，事后是害怕。新闻的曝光，无疑是砸碎了他们的饭碗，甚至要了他们的命。狗急跳墙，谁能预料他们会不会拔一把刀、拔一支枪出来呢？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曾经潜进这么一个走私摩托车集散市场采访。一个刑警走到半途，却借口汽车有毛病掉头就走。另一个部门送我们到现场，但也不敢进现场。战战兢兢地潜入现场，看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时，我们却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害怕。捂着采访机，镇静地有条有理地向当地了解情况。在采访就要结束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装在口袋的录音机转完了磁带，发出了“咔嚓”的一声。对方的目光像刀一样，削过来。天就要塌下来了——我急中生智，故意让口袋的手机掉下来，发生更大的响声。借着捡手机弯腰的工夫，关上采访机，侥幸过关。

事实上，记者生活没有太多的鲜花与掌声，更多的是心血与汗水。特别是调查性报道，随时都会“享受”危险的恐惧。每每身临危险境地，只能装作若无其事，愈加谈笑风生；而每每回到安全地带时，手心总是捏着一把汗。

尽管威胁与难堪的误解时不时地从身边掠过，随时都会猛地咬你一口，可是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都会奋不顾身。

正是这种心理，激发着我们这些“扒粪”记者冒险采访许多危险的场合。拥有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正义，就可以迎战所有的歪风邪气。一切有社会良知的记者，都会这样做！



这篇短文与其说是宣言，不如说是宣泄。以笔者的资历，并没有资格写这种文章的。但是，调查性报道确实带给热爱它的人们很多很多的快乐。只要拿起笔来，就会感觉到责任与乐趣。

在一般人眼里，“扒粪者”是一群有责任心的人。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他们不仅为社会的进步而欢呼，更多的是为蠹虫丑类蝇营狗苟拍案而起，为苍生民众的委屈不平寻找沟通。他们也是一群有道义的人。面对肮脏龌龊，他们金刚怒目，扬眉剑出鞘；面对困境弱者，他们却爱心柔肠，佛心慈悲。他们很少泡会议、蹲宾馆、跑机关、抄材料，更多的是挖掘真相，四处奔波搜集事实的细节与证据。

调查记者从某个角度记录着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对于人为造成的苦难而落后的中国，通过调查与追踪某个典型的事件，可以对民族历史与前途进行反思，探索出国家发展方向的转变。100年来，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到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从八年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大跃进”企图赶超英美到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图强。全国上下对民族历史与前途的反思与探索，最早的往往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说：找准制度创新的支点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关键。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历史再次把我们推向严峻的考验。我国过去超常规发展是在内在的动力下主动、渐进、有序地寻找体制的创新。而下一阶段使我们不能孤立地发展，不能按照自己设计的时间表去寻求国际市场的机会。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面对发展中暴露出的体制性缺陷，我们还需要启蒙，需要科学与民主意识，需要传统与现代的传承，需要朴素的公平、公正、平等。

当年刻骨铭心的创伤还隐隐作痛，未来隐蔽的危机又迫在眉睫。事实上，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惊世骇俗的新闻真相被一些人掩盖着。这些丑恶的事实就像毒瘤一样，浸透着社会的各个角落，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调查记者，无疑应该担当起“社会公器”的角色，推倒一座旧的建筑有时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在废墟上建设新大厦却必须循序渐进。

制度性缺陷影响新闻“扒粪”

在目前的中国新闻体制下，有许多雷区，不能碰，不能试。这种观念相当普遍。事实上，少数领导对民主监督有错误认识，甚至有的持“监督无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论调：

“自律论”。少数干部虽然也承认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着某些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但他们认为自我监督就能解决问题。再高明的医生也不便给自己看病。哪有医生自己给自己开胸腔的？自律就像自我保健一样，确实很重要。但到底得了什么病，要确诊就得看医生。“你不讲，我也不讲。你不讲，我不讲，大家都不讲。”——这是近几个月来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充分表明要对腐败动真格，少不了互相监督。

“影响论”。一些领导认为，将腐败现象不加掩饰地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不利于社会稳定。一些地方领导用“社会影响论”来控制民主监督。说到底这是“护短论”，是“堵嘴论”，是维护自己“政绩”、保住乌纱帽的谬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同监督有气无力有直接关系。

“效率论”。一些领导认为，监督会“降低”行政效率，许多问题都让论长道短，还要作出答复或解释，会延误决策，加大行政成本。这也是一种认识的误区。效率与精简，恰恰需要民主与民主监督的实施来提供坚实的支撑，以实现真正的效率。有了一些“小麻烦”，就可以减少决策失误以及腐败带来的“大麻烦”。

“法律论”。一些干部认为，我国有大量的法律和纪律，对不良行为会产生震慑力，没必要再强化监督。我国的法律和纪律，说少也不少，问题是执法不严。为什么不“严”呢？说一千，道一万，根子在“情大于法”。要根治这种痼疾，就要对那些替违法乱纪者说情的人“曝曝光”，治一治“替罪人说情”之罪，这样才有助于树立法律的尊严。

在这种比较片面的新闻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中国有缺陷的新闻制度，从而使“扒粪”新闻在中国的发展也呈现其片面性。

综观国内外新闻竞争，特别是平面媒体的竞争，要想在短时间内带动一个媒体品牌的提升，并且在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需要的是媒体品牌影响力。塑造媒体品牌影响力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无疑是进行“扒粪运动”。这一点无论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还是中国的《财经》杂志，都得到了印证。《孙子兵法》说，先求不败之道，再求胜人之道。新闻媒体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内容要好，不断推陈出新，这是最根本的措施。在当前处处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但又蓬勃向上的中国，调查性报道在受众中有着重要甚至有点儿神圣的地位。

目前国内最著名的媒体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周末》、“联办”的《财经》杂志、《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新华社的《新华视点》和《瞭望东方周刊》等等。这些媒体或者栏目有其共性，就是揭露社会中黑暗的一面，为受损害、受侮辱的最



底层呐喊。着眼点一般都是地方的案例，把一些丑恶的人和事物暴晒在阳光底下，接受舆论的监督。这是主流媒体调查性报道应该担当的任务。本书更多的是通过选取这些报道的案例来分析调查性报道的采编模式及其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其中不少是我在新华社内参、《新华视点》以及《瞭望东方周刊》时参与或者组织报道的案例，或许这样更能洞悉它们如何影响着中央决策。

由于有新华社内参调研的熏陶，以及《新华视点》栏目及《瞭望东方周刊》的创建与成长，笔者对调查性报道更为留心。作为开创者，《新华视点》倾注了我们太多的心血。而参与创办《瞭望东方周刊》的使命感，又使我们打出“华语第一新闻周刊”的“东方新主流”的立刊之本。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主流媒体对重点报道不可谓不重视，但为何社会影响越来越小呢？如何借鉴其优势，弥补其不足呢？

2000年，我受领导的委托，将近年来国内的重点报道与美国《时代》周刊（美国本土版和亚洲版）及国内一些流行媒体进行比较，以求拓宽视野，搞好选題和报道。比较中最大的发现是《时代》等全球权威媒体喜欢探究“深层次”问题。而我们在深入报道上却是人为地设定“扒粪”禁区。

什么是“深层次”问题？虽无定义，但通常认为就是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涉及重大理论性和方向性、涉及某些社会层面切身利益以及社会敏感等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说它是深层次，是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较深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制度根源。如果不通过深入的分析来挖掘病根，对症下药，必定是治标不治本。

当前改革已进入到深化阶段，许多深层次问题已暴露出来，需要尽快地研究解决。1. 揭示改革的难点，敢于碰“硬”。要对中央关心、群众关注的疑难问题进行巧妙的解剖，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2. 从个案入手，多层次揭示深层次问题的症结。如，为什么会出现“执法难”、“执行难”？关键就是权力干预太多。我们可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抓一些个案，揭示其中的关系。又如制假、贩假问题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发展迅猛，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究其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有的明为地方利益出发，暗中钱权相通，法制的威力在此显得苍白无力。3. 从促进工作入手，敢于揭示影响干群关系的问题。如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关键在于有些权力部门在为一些欠资的大企业撑腰。4. 以人性为基调，突出平民化。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虽然琐碎，但是平实中透出厚度——水可载舟，亦可覆舟。5. 关注影响未来生活的技术进步。蒸汽机

的出现使人类出现了工业革命，汽车和电视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网络和基因研究的突破，将把人类带向何方呢？而哪一群人又为伪科技做保护伞，骗取融资和上市的资格呢？

在传统的传播领域中，通用的准则是“独家”。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所谓的“独家新闻”可能随着传播途径的增加而越来越难以成为媒体的垄断拳头产品。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种理念在媒介策划层中逐渐弥散，那就是在信息密集的媒介市场中，要做到独领风骚必须传播“独家的观点、视角”。在受众当中“单一主题信息集纳”成了一种亮眼的“另类处理”。“扒粪”新闻当然需要独家，也需要深度。

简而言之，调查性报道应该苦心经营国家和老百姓关心的制度性“重音”。国家大事与老百姓身边事息息相关。重大事故频发的制度性缺陷、黑社会形成的政经关系、人才问题、学术腐败、“名人录”泛滥成灾……这些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这些“鸡毛蒜皮”，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呼声。真实地调查与揭露这些略为杂乱的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平等之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报道内容，也增强了可读性，日后将成为社会进步的见证。

意匠惨淡经营中

作为新鲜事件的记载体，新闻采写存在着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新闻重点在一个“新”字，今日的新闻，明日的黄花，新闻纯粹是易碎品。因此，“扒粪”报道的写作过程中，关键就是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事实真相，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一点匠心也看不出来。另一种认为，新闻创作与文学创作一样，也要经过充分的构想，精心安排，谋篇布局，要有逻辑性，层次分明。遣词造句要认真推敲，不能轻易下笔。正所谓“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

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说过，汉语在世界众多语言中独具特色，其中之一就是汉文讲究炼字炼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大师们强调的是文学创作。其实，新闻创作也理应讲究锻炼。特别是当前新闻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用户与读者不仅要求大量的信息，还需要精美的形式表达更多的信息。因此，炼字炼句很有必要。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改文风、改作风。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离精品还相差甚远。“语不惊人死

不休”，杜甫的名句很有针对性。新闻作品也需要字斟句酌，苦心孤诣。

有人提出，新闻是易碎品，没有必要像八股文似的惨淡经营，否则就有一种强作新闻的迹象。确实，苦心孤诣并不意味着能写出好的新闻作品。六朝的骈体文作家，唐宋八大家，明代正统派、公安派甚至清代的桐城派，都一脉相承地主张惨淡经营。但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并不多。新闻作品也是如此。许多“扒粪者”都深有体会——煞费心机搞调查，绞尽脑汁写作品，结果还是不如遇上一个突发性事件令人关注。此话不假。可是，没有平常的“炼”功，就算是碰到重大的事件，又拿什么去准确表达呢？又如何知道什么是“重大”呢？突发性事件是易碎的，但延续易碎新闻的体裁，更是发人深思的。笔者在2000年采写的调查性报道《但愿悲剧不再重演——江西萍乡“3·11”爆炸事故追踪》和《悲剧为何一再重演——对我国重大事故的反思》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采用情况良好，在推动“事故问责制”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关键因素就是匠心挖掘易碎新闻的幕后，延续突发性新闻的生命周期，并对社会症结进行剖析。结果读者来电、来信甚多，社会影响很好，被包括《新华月报》在内的近百家媒体选摘。

惨淡经营未必能经营出好作品，但好的“扒粪”新闻必定是惨淡经营的。一字一句绞尽脑汁，尽量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字眼，尽量字字珠玑。

光有勤奋的惨淡经营也不够，写“扒粪”要心中有“货”，有东西可说。如果腹中无墨，空空如也，任凭你绞尽脑汁，也下笔无神，无济于事。在搜集到新闻材料后，如何立意新闻还是要注重思维方法。思考角度的灵巧与笨拙，取决于知识的多寡。能不能深入实际是一方面，能不能把实际情况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关键还是取决于思维模式。思维的锻炼，除了天生的一点慧根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所谓的新闻敏感，其实就是一种积累的敏感，素养的爆发。古人说的“厚积薄发”，说的就是要重视“修炼内功”，把基础打好。不然，书到用时方恨少，脑海空荡无物，字句干瘪，言之无物。

在中国的社会转轨过程中，新闻资料很丰富。“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成为现实。然而，在材料俯仰可拾的地方，也有人感慨无物可写。这说明，新闻创作也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不积累，岂得有感悟？陆游所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正是这个道理。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作为调查性报道，就是要对治理国家治理社会产生效用。所谓改革，就是要戮力创新。不仅是形式创新，更是内容创新。创新的过程就要经营。经营要立意，找到问题的关键。“立言”的目的是“明



道”。如何明道，是功夫，更是发挥“人民喉舌”作用的重要手段。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研究“新华栏目”的经验中提到，《新华视点》取得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很多条，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善于围绕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精心组织深度报道。“三点式”报道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起到明显效果。从实际社会效果上看，中国的“扒粪”需要达到“三满意”：党和国务院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和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自然，作为揭示现实生活的实质，新闻作品必须尊重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能够把客观写透，入木三分，作品就算成功了。“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古今中外的名篇可以借鉴，但结合国情社情踏实创新是关键。“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的要求是太高了，不是三年两载就能达到的，但踏实创作一些自成一家的逼真的习作还是可以的。

实践证明，调查性报道需要炼字句、炼题旨、炼境界，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见效的是炼作风。正如新华社已故社长郭超人所说，在推进新闻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新闻工作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不断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这是新闻改革顺利进行的保证。当前中国新闻界里有的人工作态度确实不严肃，作风飘浮，得过且过，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经营业务上来。这种态度很难经营出好的有启示意义的习作来。当然，并非所有“扒粪”新闻都是从容做出的，失败的稿件也不少。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没把“玩命精神”落到实处。

让真相充分传播

调查性报道采编完毕，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此时离“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境界还相去甚远，还需要整合各种资源，需要各方大力支持与配合。调查性报道的成败，不仅取决于采编过程揭露真相的程度，也与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密切相关。

媒体的个性特点决定了媒体对传者的要求。从大的方面来说，报纸、广播、电视有着诸多的共性，存在着诸多共同规律；但每一种媒介又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即使属同一种媒体，不同的报纸、不同的电台、不同的电视台，由于面对的对象不同，办报、办台的宗旨有别，所负的具体使命各异，它们所展现的个性特点也是各不一样的。对于传者来说，报道同样的事实，为不同的媒体撰稿，为同类媒体中的不同新闻机构撰稿，应该体现差异，应当遵循适切性原则。相反，以

同一模式为不同的新闻媒体撰稿，终会因抹杀媒体个性而影响传播的效果。^①

媒体数量的增加，为“扒粪”新闻提高社会影响力创造了条件。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200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统计资料，2004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90种。全国共出版报纸1922种，与上年相比，种数下降9.3%，平均期印数增长2.36%，总印数增长5.03%。其中，全国和省级报纸1010种，全国性报纸218种，省级报纸792种，地、市级报纸858种，县级报纸54种，综合报纸941种，专业报纸981种。报纸进口757种次、1317万份。

2004年，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教育台60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470万，30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122万。年末综合人口覆盖率广播为94.1%，电视为95.3%。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全国覆盖率达到82%，中心城市入户率达到98%。

2004年新华社对内、对外共编发各类公开新闻信息稿件225万多条，编发和报送国内、国际内部报道稿件近4万篇，新华网在世界1000多万个网站中综合排名进入前50位，最高单日综合排名跃居第33位，在国内新闻网站中综合排名第一。其中国内分社新闻信息产品的营销利润所占经营利润的比重由3年前的20%上升到80%。

2004年全国手机移动短信业务量达2177.6亿条，比去年同期增长58.8%，以每条0.1元计，收入超过217亿元。截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电话用户突破7亿，其中固定电话3.3748亿户，移动电话3.63168亿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5年1月19日发布《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4年12月底，中国上网用户总数为9400万，比上年同期增长8.0%，其中使用宽带上网人数4280万，上网计算机4160万台。CN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43万和66.9万。报告同时显示，网民每周上网13.2个小时。预计2010年使用宽带上网的人数将达1亿。CNNIC发布截至2005年6月30日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总数已达10300万，半年增加了900万人，其中宽带上网人数达5300万，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上网计算机数量达到4560万台，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容量为82617M，网站数达到67.7万个。IP地址达到6830万个，超过4个A类地址，拥有量排名世界第四。统计发现用户使用互联网的八大热门服务依次是：电子邮箱、浏览新闻、搜索引擎和浏览非新闻类网页等。2005年7月上旬，中国社科院

^① McQuail, Denis.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05 年中国 5 城市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影响调查报告》宣布，79%的网民把互联网看作是信息中心，55.1%的人认为是“新闻媒体”。^①

调查显示，目前受众还是更信任传统媒体，最信任的新闻来源依次是国内电视、国内报纸和国内广播新闻，网民最信任的网络新闻首先也是国内传统媒体所办的网站，但越年轻的受众，越倾向于信任网络媒体。^②这些数据表明，目前的媒体市场中媒体的种类越来越多。要达到影响社会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在选择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上运用一定的技巧。如何通过议题设置，利用现存的各种媒体来制造出一个声势浩大的“公共空间”，促进事情的解决，这是本书要探讨的。

打造“扒粪”平台

传播决定“扒粪”的效果。传播需要平台。从美国“扒粪运动”的经验来看，期刊在“扒粪”细分平台的表现十分突出。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赫钦斯说：“鲁斯（《时代》和《财富》的创办人）和他的杂志对于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制度的总和。”这略显夸张的评语，足以说明主流时政周刊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日前，中国最富有潜力的“扒粪”平台也许是新闻周刊。然而，尽管许多新闻周刊提出“中国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但这些有鸿鹄之志的媒体尚有许多先天不足。从时政周刊的发行量来说，中国的周刊除《瞭望》周刊外，没有一本真正发行量超过 5 万册；从内容上，这些周刊基本上都打着“扒粪”的概念，努力做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先锋。然而，除了双周刊《财经》杂志创造出国际名声外，其他的在调查性报道上尚未出现质变。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周刊人才的成熟，估计在未来三两年中国时政周刊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羊群效应”下，大多数读者会认可前一二名的时政周刊，而其他的可能会被市场淘汰，或者另走他路。本书还要探讨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利用“扒粪”来塑造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打造“社会公器”的品牌。

时政周刊的读者是谁呢？《瞭望东方周刊》在创刊前调查确定为：25~50 岁，男性为主，月收入在 4 000 元以上，生活、工作在大城市，大多数具有良好教育

① 孙正一，柳婷婷．2005：中国新闻业回望（上）．新闻记者，2005（12），见：<http://xwjz.eastday.com/eastday/xwjz/node104025/node104026/userobject1ai1691925.html>

② 同上

背景，可能是老板和高级主管一级的人物，也可能是西装革履、在写字楼的普通白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社会新兴阶层，是资本的掌握者和追逐者，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身份并掌握一定资源。他们关注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对自己地位和财富的影响，希望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洞察国家、社会和周边环境能否提供给他们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的机遇和条件。

英美主流新闻周刊的诞生与成长，也印证了“扒粪”新闻与经济基础对于新闻周刊的重要性。1923年3月，《时代》的诞生正值美国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期、报业繁荣之际。亨利·鲁斯提出做“慢新闻”，倡导在报道事实基础上加以分析、评论，给忙碌人群梳理出有价值的观念。经过十几年的“扒粪”，到20世纪40年代时，《时代》已成为一份左右美国公众舆论的新闻周刊。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份杂志基本能够影响世界的时政界。

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出现《时代》、《新闻周刊》、《经济学家》那样具有国际声誉的新闻周刊，甚至也没有像香港《亚洲周刊》、台湾《天下》那样在区域市场获得共识的新闻周刊。在国内最具“扒粪”精神的刊物里，也许《财经》杂志能够赢得国际声誉，但迟迟无法改为周刊，从而实现它的更大影响力。《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民周刊》等少数几份周刊也具有“扒粪”色彩，但表现与立场都不稳定，尚没有成为潜在的具有在华人语境里产生深远影响的新闻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曾经在创刊被寄予“扒粪”先锋的厚望。《南方周末》前副主编、著名报人钱钢说：“娱乐性的八卦新闻，大家都看烦了，《瞭望东方》适合正在找这种刊物的读者。”2003年11月30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以《瞭望东方升起变革的阳光》为题写道，新华社另创《瞭望东方》“意味着党的喉舌也以新的变奏，敲击体制内新闻变革力量的鼓声”。“新华社也醒了？那么媒体改革的救世主就要将临了。”两年多的实践表明，一如《中国新闻周刊》和《南风窗》一样，核心团队的不稳定以及管理体制问题严重影响到《瞭望东方周刊》“扒粪”理念的延续与操作，没有像《财经》杂志那样赋予“扒粪”新闻历史的厚重感与时代的价值观。这说明，急于求成是“扒粪运动”的大忌，苦心经营才能承担社会责任。“扒粪”媒体的品牌化、价值观和产权等问题，将在第7、8章详细探讨。

因而，中国的时政周刊在“扒粪”上面还需要艰苦的“蜕变”。新闻时政周刊在中国，如同汽车消费一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对于大多数周刊从业人员来说，要实现文人向文化商人的转变并不轻松。“中国的杂志人到现在还有五四情



结，”新闻出版总署一名从事期刊研究的官员说，“现在的杂志消费者却可能比办杂志的人水平还要高。”在这种情况下，时政周刊容易在内容或者营销上，出现与目标读者“错位”的现象。目前，媒体不仅缺乏受到良好教育、具有国际背景的做内容的专业性人才，也缺乏推广媒体的营销人员。

随着国外专才的“回流”以及本土队伍的成熟，几年后中国也许会出现一两本发行量突破 20 万大关的具有鲜明“扒粪”精神的时政新闻周刊。这些时政周刊应以市场化的叙事方式，对重大新闻事件和政策提供权威而清晰的官方阐释，以超越现有刊物的“民间揣测”，为目标读者提供更可靠和有实用价值的资讯。这些周刊会有完善的国内外信息采集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做好硬新闻报道，尤其是重大事件和重大政策上，在深度和广度上提供“一锤定音”的版本。同时，这些周刊在“扒粪”新闻的价值观上要具有鲜明的启蒙与民主思想，不为“扒粪”而“扒粪”，不为生存而“扒粪”，只为社会进步而“扒粪”。

本书从实证角度，通过个人从业的经验和观察，以及 2002~2005 年对王克勤、朱玉等 50 多名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深度访谈进行课题研究。这些被访者既有中央媒体以及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甘肃等地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中宣部等管理机构的官员，跨国媒体公司在中国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内外一些研究媒体的学者。所有被访者都被告知将以匿名的方式发表其言论并且为其保密。由于中国国情，部分访谈在饭店、咖啡厅之类的非正式场合进行。

本书共分 9 章。第 1 章介绍国内外对调查性报道的理论认识以及传播效果的模式。第 2 章到第 4 章从具体稿件入手，用反走私、黑社会、事故黑幕等案例，说明和分析调查性报道如何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从而达到影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微观的分析穿插着调查性报道的采编手法和传播技巧，虽然选取的大多数是笔者当年的经验与教训，但对了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有一定的帮助。第 5、6 章分别从记者良知、调查报道细分化与品牌化两方面入手，在中观层面分析中国“扒粪运动”中调查性报道对记者以及媒体本身的要求与影响。第 7、8 章从宏观层面结合中国的国情，探讨危机公关和媒体传播、媒体产权与议题等方面的关系。第 9 章为简要的结论。

此书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与支持。首先感谢资深编辑赵泓先生的信任与鼓励，使得我的一些想法能够落实到文字上；其次要感谢许多一直从事调查性报道的领导和朋友提供大量的方便与合作，如《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姜军、《新华视点》主任陈芸、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任卫东，以及沈锡权、黄全权、于津涛、程瑛、林楚方、朱玉、吴亮、崔军强、索研、徐超、王